

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书写^{*1}

陈海燕

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一批以江西为背景、反映江西地域文化的作品。这些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，对江西山川、风物、民俗作了详细记录，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晚清至民国江西形象的描摹。作家在作品中渗透了深厚的乡愁意识和家国情怀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，既有认同，又有审慎的批判。通过研究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书写，不仅可以丰富地域文学史的研究，而且可以在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热点中，发现江西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互动。

【关键词】：现代文学；赣文化；地域文化；民俗风情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I206.6 【文献标识码】：A 【文章编号】：1004—518X（2017）11—0120—07

金克木曾提出“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”^[1]。地域文化与文学关联紧密，不仅影响作家的创作观念，而且成为文学家笔下重要的表现内容。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书写，是指产生于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段，以江西为主要背景或描摹江西地域形象的文学创作。考察的作品除白话作品外，还包括这一时期的文言创作，及旅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及其作品。对于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书写，研究者习惯从本土作家特别是地域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考察。但事实上，记录在吴海、曾子鲁主编的《江西文学史》的现代知名作家如白采、罗黑芷、王礼锡、朱企霞、饶孟侃、邹韬奋、熊佛西等作家，他们虽因籍贯被列入江西地域文学史，但作品极少以江西为背景，地域文化色彩淡薄。

关注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书写，就要跳出地域文学的藩篱，扩大研究范围，考察曾旅居江西的外省籍作家，甚至一些旅外作家对江西的记录，那么反映江西地域文化的作品就显得蔚为可观了。作家张恨水，出生、成长、文学启蒙都在江西，留下大量与江西有关的文学作品，1932年连载于上海《晨报》的长篇章回体小说《北雁南飞》，及散文集《湖山怀旧录》以及其散见的作品，极富江西地域特色，蕴含丰富的江西文化。近些年，一些旅外作家如蒋彝、熊式一作品的推介，不仅是江西地域文学的新发现，也从文学角度大大丰富了江西地域文化研究。蒋彝是外来词“可口可乐”的著名译者，以“哑行者”为笔名在西方写作，出版游记《湖区画记》，1940年出版故乡回忆录《儿时琐忆》。旅英作家熊式一1943年出版以赣地南昌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天桥》，最先以英文在西方发表，后译作中文，先后在中国港台出版，近几年才有了大陆版。

陈子善说：“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，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，一是林语堂，二是蒋彝，三就是……熊式一。”^{[2] (P3)} 这三位双语写作的大家，其中两位都是江西人，只因他们长年旅居海外，这两位“值得大书特书”的大作家及其作品没有引起江西地域文学的重视。张恨水民俗文化作品的再整理，熊式一、蒋彝海外作家的复位，使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书写更为饱满，亦丰富了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互动。

一、富有鲜明江西地域特点的风景画描写

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山川地理、土特名产、生产生活，连人们的性情也各不相同。文学大家不仅能写出不同地域文化的深厚意蕴，更能显示地域文化的与众不同。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，对江西展开了多彩的风景画描写，显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。

¹ 基金项目：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现代文学视野下的赣文化研究”（ZGW1319）

陈海燕，江西广播电视大学讲师。（江西南昌 330046）

（一）壮丽的赣地山水风光图

江西山川秀丽，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青睐，孕育了丰富的山水文学作品。庐山、石钟山、小孤山、鄱阳湖，“吴头楚尾”的江南风光，都是作家竞相表现的对象，其中又尤以庐山为胜。作为民国“夏都”的庐山，现代文学史上的记录依然丰盛，胡适的《庐山游记》、徐志摩《庐山小诗两首》《庐山石工歌》、孙福熙的《庐山》，以及江西籍古典文人陈三立、胡先骕大量关于庐陵山水的文学作品，甚至在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笔下，都表现出对江西山水的独特喜爱。徐志摩的庐山云雾缭绕，胡适的庐山则寄托了他的文化思考。这些纪游作品真实描绘江西的山川秀色，构成一幅幅壮丽的风景画。陈三立笔下的西山壮丽雄奇：“冉冉破山光，众象掬盈手。西岭奔长蛇，舔霄昂其首。”^[3]（P42）张恨水的江西山城清新秀丽：“乡人沿山道为圃，满种芥麦油菜，柳下淡黄微紫……”^[4]（P16）

小说创作也喜以江西山水风光为背景，采用山水景观与人物活动相互映衬的抒情性写法。庐山牯岭是茅盾开启文学思考的起点，在此酝酿了他的文艺论文《从牯岭到东京》，并以庐山为背景创作小说《幻灭》《牯岭之思》。张恨水《如此江山》，在庐山云雾中布了一个局，写了一段三角恋，最终男主角冲破迷雾，突破个人情感的困扰，投身革命。阅读这些作品，读者不仅可以感受主人公命运与情感，还能受到江西壮丽山水的感召。民俗作家们则饶有兴味地勾勒出江西农村或湖镇或省城风景。熊式一的《天桥》对家乡南昌的景观如数家珍：进贤门、德胜门、章江门等古城门；洗马池、嫁妆街、系马桩、三眼井等重要街巷；孺子亭、百花洲、状元桥、绳金塔、滕王阁等名胜古迹；甚至清末的男女教会学校：豫章中学、葆灵女中，也能在《天桥》中找到。

（二）鲜明江西地域特点的风俗画

现代文学作品展现赣地独特风貌：山清水秀，鱼米之乡，民风淳朴中又带着赣人的固执、保守。不管是写当地土产，还是乡规民约、生活习惯，甚至作品的人物语言、叙述语言都显现出地域特征，极具“赣味”，是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描写。张恨水的《北雁南飞》，取材自作者少年时在江西新淦三湖镇的读书和生活经历。小说开篇就对故事发生地进行了一段自然、社会环境描写，描绘出一幅极富江西特点的湖镇风光图。这里风景幽绝，清江绿树，是诗书礼仪之乡，相应民风也较为保守：

“临江府，清江县，三岁个伢子卖包面。”这是江西南昌城里一种歌谣。清江两字，也有改为新淦的。因为清江、新淦两县的人，在省城里挑担子卖馄饨的很多，差不多是包办了这种买卖。馄饨这东西，南昌人叫作清汤，清江、新淦人，叫做包面。三岁个伢子，是说三岁的小孩子。总而言之，是形容清江、新淦对于馄饨业之发达。当然这不无鄙笑的意思，其实这两县是餐鱼稻饭之乡，文化也并不低落，尤其是新淦县属的三湖镇一带，风景幽绝，是令人留恋的一个所在。^[5]（P1）

这一段文字清新晓畅，蕴含丰富的民俗事象。民间歌谣、赣地方言、风物土产、人民风尚，是全方位的风俗画描写。之后介绍当地“甜美的出产”——橘子、商业习俗——贩卖水果，再写到生产习俗——赣江放排……这是江西一个典型的湖镇，盛产红橘，作品对于橘林的描写贯穿始终，将少年心事与四季常绿的橘林、洁白的橘花相互映衬，充满意境之美。“三湖红橘”在宋代即已出名，南宋诗人范成大赞美这里的风光“芳林不断清江曲，倒影入江江水绿”^[6]（P579）。

二、记录晚清到民国的江西民俗

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江西地域书写，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情景，留下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珍贵的民俗资料。蒋彝、熊式一、张恨水三位民俗大家，无微不至地展现九江、南昌、新淦的民俗文化。陈三立以及学衡派代表人物胡先骕，创作足迹遍布江西各地，或慨叹名山大川，或咏物怀人，或追思先祖，他们的山川风物描写间接对江西民俗文化作了记录。陈三立晚年在庐山，认为庐山风物发生变化，成为西方人的聚居所，有必要对此记录，因此主推《庐山志》的编撰。“牯牛岭一隅为海客赁为避暑地，屋宇并列，万众辐辏，寝成一都会，尤庐山系世变沿革之大者，不可不综始末，备掌故也。”^[7]（P225）此志约请李四光、胡先骕撰写有关章节，1933年刊印成册。现代文学中的江西民俗文化涉及社会方方面面。

（一）衣、食、住、行等日常生活习俗

蒋彝的回忆散文集《儿时琐忆》是对九江风俗百科全书式的记录,遍布衣食住行,文化传统,民间游艺、岁时节日……蒋彝又是一位有成就的画家,为书配了上百幅插图,九江的城墙,供奉宗牌位的堂屋,妇女服饰发型,各种小商贩……蒋彝的文字平和从容、不疾不徐地叙说九江往事,是以文学形式记录九江民俗文化最为珍贵的记忆。“其中的文图史料足以填补江西近代社会风俗史研究的空缺。”^{[8] (P165)}《头发的麻烦》一文道尽了中国人的发辫史,从人出生到成人发型的变化,头发的梳理与保养,头发的人生意义,直至辛亥革命后移风易俗,男人辫子的剪除。在文中,蒋彝正好显示其绘画特长,以绘画形式配出了足足十三种发型。

（二）人生重大礼仪习俗

沈从文笔下的民情风俗是原始牧歌式的,老舍笔下的民俗文化的特点是温和厚重的,熊式一的民俗文化作品《天桥》则充满烟火气。在写南昌人的人生重大礼仪时,熊式一可谓民俗专家。对南昌城乡求子生子、婚丧嫁娶等风俗,写得细节备至、程序完整。而且充满了南昌人的急吼吼、吵嚷嚷的气息,反映了赣地人性情。结婚的礼仪程序如做嫁衣、文定之礼、辞堂、上花烛、照轿、亲迎、登堂等都做了详细的描写。“上花烛是小登科,小明那天特别的沐浴,把旧衣服完全换了新衣服,剃头,用大红丝带做发辫的穗子,祭祀了天地祖先拜了母亲之后,也和连芬一样,由四个男孩子,陪着他坐在上面一台开席上吃酒。”^{[9] (P145)}江西流传的民俗中,新郎着礼服入席上坐,俗称“小登科第”,陪餐的为没有成婚的后生。^{[10] (P244)}

（三）岁时节日习俗

一年四季的传统节日,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。节日有固定的节期,且配有相应的民俗活动。江西作为传统农业型区域,岁时节日习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。散文集《儿时琐忆》对全年节日进行了忠实的记录。除夕、元宵、清明、立夏、端午、七夕、重阳……伴随节日的各种庆祝礼仪如腌制腊肉、敬祖、礼训、放鞭炮、吃粉蒸肉、乞巧、赛龙舟、放风筝等无不写得活色生香,充满生活气息。《过年》对江西人的春节习俗描写细致,从准备腊味与腌菜,再写到腊味的品种、腌制过程,再到除夕敬祝、祭祖,写出了中国人的年味,充满人情味。

（四）家族、宗族、村落等规约习俗

中国人以血亲为纽带,形成家族、宗族、村落等各种社会关系,并缔结各种规约,要求全体成员共同遵守,表现出符合标准的言行举止。蒋彝的《蒋氏一家》记录了家族血亲关系,“我们这个家庭有五十多口人……家庭成员之间的称呼,决不会叫错,因为长幼各有专门的称呼……”^{[8] (P8)}记录了家庭秩序,并各种吃团年饭,敬祖、述家谱、记家训等各种家族活动。《北雁南飞》表现村落习俗,涉及家庭关系。作品中江西民风保守,要求女性“三从”“四德”。一对夫妇反目,造成了夫家与娘家之间的村落不合,于是进行械斗——“打大阵”,显示出好勇斗狠的民风。也有避免冲突的村落调停:“原来这也是地方的风俗,每到械斗的时候,前后若干姓的邻村,都得联合着,推出一班绅士来,向两方面劝和。”^{[5] (P375)}

三、深厚的乡愁意识和家国情怀

一些作家虽未纳入江西地域文学史,但他们成长于江西,深受江西地域文化的浸濡,之后游历异国他乡,对江西保有深深的故土情结。不管是张恨水对三湖镇的记录,还是熊式一借李大同表达对故乡南昌的记忆,还是蒋彝对九江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录,都渗透着作者浓厚的乡愁意识与家国情怀。地域文化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地域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民俗文化最能体现鲜明的地域特征,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文化。“这种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凝聚力,不但要使朝夕生活、呼吸在一起的成员,被那无形的仙绳捆束在一起,把现在活着的人跟已经逝去的祖宗、前辈连结在一起,而且它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五大洲的华侨、华裔的人们也团结在一起。”^{[11] (P54)}

（一）旅外作家的乡愁意识

作家们受江西地域文化影响，完成人生启蒙，即使远走异地他乡，漂洋过海，也时刻受到原生文化的召唤。小说《天桥》《北雁南飞》，散文集《儿时琐忆》都杂糅着作者的青年经历，有很强的自传性。《天桥》既是一部具有宏大社会背景的小说，也是对故乡风土的记录，寄托了海外游子的深厚乡情。主人公李大同革命后回到家乡，面对城市乡土的沧桑变化，感慨万千。“一个天涯游子，在外十几年，一旦回到他的本乡本土，自小生长之地，幼时游钓之处，心中有一种无限的安慰，无限的快乐。”^{[9] (P300)}李大同的心情是熊式一真实的内心投射，写出了身为漂泊者的感伤。《天桥》曾引发江西同乡陈寅恪的共鸣，题诗曰：“海外林熊各擅场，卢前王后费评量。北都旧俗非吾识，爱听天桥话故乡。”^{[9] (P12)}陈寅恪长期居住北平，但在诗中表示自己对北方并不了解，而对《天桥》中表现的江西风情一往情深。陈寅恪曾多次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他的江西故乡情。蒋彝更是如此，《我的故乡》深情回忆九江：“在城墙上漫步，曾消磨我许多时光。我从城上眺望，全城房屋栉比，庭院历历在目，城外则江流无际，南山屏立，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景啊！”^{[8] (P3)}这些文字真切再现了记忆中的良辰美景，更寄托作者对家乡的深厚乡愁。

《北雁南飞》完全可以与张恨水自述《我的创作和生活》《写作生涯回忆》对照起来看，剧中主人公李小秋生活的环境，拜师、阅读、学诗与张恨水在江西的生活、求学经历完全一致。作品的少年情思是张恨水对童年江西生活的眷恋和回忆。

（二）旧式文人的家国情怀

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，决定了江西文人的内在气质和审美取向。江西文人格守儒学正统观念，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江西古、近代文学“文学观念上显示出强烈的正统性”。^{[12] (P7-10)}1919年以后，白话文学在与文言文的较量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，但是有许多从旧文化传统过来的人，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。民国时期，江西旧式文人如汪辟疆、王易、胡先骕、陈三立依然坚持旧式文体写作。被称为“最后一位古典诗人”的陈三立，不仅文采斐然，而且人格高尚，晚年誓不降寇，绝食殉国。他留下大量有关江西的诗文创作，足迹遍布家乡义宁、南昌、九江、庐山等地，他的《云雾茶吟》《杂说》《靖庐记》《南昌东湖六忠祠记》《快阁铭》《南昌熊季廉墓志铭》《长男衡恪传》等作品大量记载江西山川风物，刻画了诸多江西人形象，表现出赣人性情与精神生活。

陈三立父亲陈宝箴葬于南昌西山，在西山建有陈氏故居称“靖庐”，靖庐故居也成为陈三立、陈寅恪父子梦牵魂绕的地方，在作品中多次记叙。陈三立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一批悼亡扫墓诗：“凡涉靖庐诸作，皆真挚沉痛，字字如迸血泪，苍茫家国之感，悉寓于诗。”^{[7] (P261)}这些文字融山川风物与故人记悼于一体，展现了赣人文节俱高、义烈千秋之品性。陈寅恪作于1945年的《忆故居》：“破碎河山迎胜利，残余岁月馀凄凉。松门松菊何年梦，且认他乡做故乡。”^{[13] (P38)}“松门”“松菊”分别指陈氏家族在庐山与南昌的故居。抗日胜利之后，作者卧病成都，暮境凄凉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悲交织在一起，是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写照，形成了感人至深的审美意境。

张恨水早期多写通俗言情作品，但到了关键时刻，他的家国情怀会迸发出来，显出严肃而激荡的底子。1939年春，日寇进攻南昌，张恨水连续发表《老爷庙》《伟大的南昌》《忆香妃墓》《江西人与许真君》等系列介绍南昌的地理名胜、人文古迹的知识性文章。“在这些知识性文章中，寄寓着激励读者抗战意识的思想。”^{[14] (P276)}“南浦朝云，西山暮雨，乃为日寇炮火所替代，视妃殡节时之惨痛，千百倍之。赣人或亦睹先烈之英风而有以兴起乎。”^{[4] (P198)}文字慷慨激昂，以江西人的固有气节激励人民战斗。

四、对江西文化的认同与审慎的批判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决绝的一面，现代文学对因循守旧鄙陋的乡风民俗如典妻、冥婚，迷信等，向来予以猛烈的批判。与国内作家强烈的批判不同，对旅外作家熊式一、蒋彝而言，因为特殊的境遇，他们对

传统文化的展示是比较慎重的，尽量避免传统文化中鄙陋或不合潮流的一面，而选择有中国民族特点但不极端的民俗，随之而来的，则是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。在西方族群生存的中国作家，要面对西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与猎奇。熊式一在国外经常被问有无蓄妾，抽大烟，夫人有无裹小脚。“当初我真不明白，他们为了什么总不肯相信我的解释，三十多年以来，我们再也没有蓄辫子，而且早在很久之前，妇女也不缠小脚。”^{[15] (P130)}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，甚至写在西人的教科书里。这种偏见拷问着海外作家的自尊心和责任感，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创作，扭转西方人心目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形象。

（一）对传统文化予以合情合理的表现，并持以审慎批判

旅外作家力求证明中国文化不全是与现代文明完全不符的奇风陋习，侧重展示中国人更广泛的人生与共通的人性。他们对中国人的文化、日常人生作客观、全面的记录，写中国人日常人生，衣食住行，把许多饶有趣味的民间生活习俗表现出来，当然也有意无意地把民族极端陋习避开。熊式一在英国写剧本《王宝钏》时，即对多妻制作了必要修改，以期符合西方人观念，即便如此，还是触犯中国人敏感的自尊心，被国内一些作家所诟病，认为是扬家丑。所以，对蒋彝、熊式一而言，他们在表现中国民俗文化时必然秉持谨慎的态度，有必要“把中国人表现得入情入理，大家都是完完全全有理性的动物，虽然其中有智有愚，有贤有不肖的，这也和世界各国的人一样”^{[9] (P14)}。

熊式一在表现民俗时重在表现生产生活秩序，人生重大礼仪，如生子、婚姻、丧葬等流程，其中固然有落后、愚昧的一面，但并不触及中国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，以维护中国人正常、正面的形象，这也是处于其时其地旅外作家的必然选择。《天桥》中的乡绅李明是被批判的对象，他有迷信、多子多福的观念，虽然妻子不生养，但他因吝啬并不娶二房，有意避开了西方人猎奇的蓄妾。蒋彝则通过亲切的、富有人情味的散文，写实记录，力图表现中国人性中可爱的、安稳的一面，即使在讲究等级秩序的封建大家族中，也以温情一面为主。“他们克己守法，无所作为，过着一种恬淡的牧歌式的生活。”“中国人爱人敬人，爱好和平。”谴责西方人“自视优越便易于强加于人”。^{[8] (P159)}蒋彝赞颂了中国人天性中的勤劳善良，呼吁西方人正视中国：民族有风俗习惯不同，但没有优劣之分。

对民俗中迷信、愚昧、保守的一面，作者也予以文化批判。江西学者傅修延曾谈到赣人具有“盆地心态”，表现为比较封闭，视野比较狭窄，具有“保守性”。^{[16] (P100)}这种文化特征在现代文学中也表现出来。写到中国年节放鞭炮的习俗时，蒋彝感叹：“为什么我们不把火药的发明用于轰炸呢？或许这只是因为：虽然中国人民发明了火药，都只想到可供娱乐，却从来想不到用于杀人的目的吧！”^{[8] (P147)}蒋彝的态度是复杂的，既有对中国人天生敦厚、爱好和平的赞美，又有不思进取、缺乏现代意识的批判。《天桥》中的乡绅李明的旧式家庭以及他身后所代表的封建文化，以及张恨水笔下的三湖古镇因循守旧，要求妇女恪守“三从”“四德”，对年轻人爱情的扼杀，都体现了作者的文化批判精神。

（二）展现了因袭中的变化，反映了清末民初的移风易俗

晚清到民国，中国大地承载着重大裂变，风俗民情也在悄然发生变化，不管是本土还是旅外作家，都在作品中表现了时代的变迁、移风易俗的一面。表现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，让西方人认识一个变化中的中国，也是旅外作家创作的目的之一。

《天桥》中李大同由一个封建积弊深重的乡绅家族的养子，最后成为革命者的历程，穿插叙述了变法、起义、清帝退位、民国肇始，反映了时代变革，体现出西风东渐、移风易俗的一面。李大同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理想，既有传统敦厚勤奋的民族性格，又有勇于变革，顺应潮流的精神品质。女主角莲芬与李大同倾心相爱，爱情的追求比李大同还要大胆，走上逃婚、婚姻自决的道路。李大同革命后回到南昌，看到废墟中的滕王阁：“这一所有名的文艺纪念建筑物，算是付出了革命的代价。”^{[9] (P299)}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达对革新的赞成及对传统文化的审视，向西方人传递这样的信息：中国在发生着革命，人民在觉醒和进步。

《北雁南飞》写的是少年的恋爱，总体还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上，但新观念、新思想已经萌发。从省城来的少年李

小秋，来到新淦三湖镇，他于小镇的意义是带来了新的观念与进步。三湖镇古朴、保守，文化上还在遵守旧伦常。女主人公春华，因为父亲开风气之先，可以跟着读书，但整个古镇环境与家族教育还是旧式的。她身上的传统文化与新观念存在矛盾，一方面向往佳人才子的本能，一方面又不敢不顾家风、不要三从四德，体现了社会渐变中的人物真实心理。

五、结语

江西文化不仅影响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内容，使作家打上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，而且在文学创作特点上呈现出一些共性。除此之外，关注江西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互动还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。

首先从现代文学的角度描述江西文化，扩大了江西地域文化的研究视野。从研究现状看，江西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，少量涉及当代文学，极少从现代文学的视野对江西地域文化进行描述。凡是能反映赣文化、记录江西形象的现代文学作品都应是研究对象。不仅要研究江西本土作家，也要研究外省作家，对外籍作家及长期旅居国外的作家记录赣文化的作品进行梳理。

其次丰富了江西地域文学史的研究，补充了《江西文学史》一些未予关注的作家。近些年被中国大陆发现的南昌籍作家熊式一、九江籍作家蒋彝，都没有在江西地域文学史中提及。他们长期居住海外，又因为人为原因造成历史隔阂。熊式一曾为蒋介石作传，胡先骕为学寅派代表人物，曾与新文学有过论战，以往文学史多讳言或贬低此类作家。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，文学也将以更豁达的胸怀对他们进行价值重估，给予客观的评价。

最后从区域文化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的热点中，补充了赣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。京派、海派、湘楚、吴越、东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十分热门，独缺少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。赣文化的表现是厚重的，但不那么强势，研究者绝不可以妄自菲薄，只要将研究工作做得更细致、更深入，一定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发现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金克木. 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 [J]. 读书杂志, 1986, (4).
- [2] 陈子善. 关于熊式一《天桥》的断想 [A]. 熊式一. 天桥 [M].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2.
- [3] 胡迎建. 民国旧体诗史稿 [M].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5.
- [4] 张恨水. 张恨水散文 (第2卷) [M].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1995.
- [5] 张恨水. 北雁南飞 [M].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
- [6] 许怀林. 江西文化 [M].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6.
- [7] 胡迎建. 一代宗师陈三立 [M].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05.
- [8] 蒋彝. 儿时琐忆 [M].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5.
- [9] 熊式一. 天桥 [M].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2.

-
- [10] 余悦.江西民俗 [M] .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4.
- [11] 钟敬文.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 [M] .上海：中华书局，1996.
- [12] 吴海，曾子鲁.江西文学史 [M] .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.
- [13] 陈寅恪.陈寅恪诗集 [M] .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1993.
- [14] 胡正强.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 [M] .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03.
- [15] 熊式一.八十回忆 [M] .北京：海豚出版社，2010.
- [16] 赣文化研究 [C] .南昌：南昌大学赣文化研究所，1994.